

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回望与省察

朱向前 傅逸尘

【摘要】本文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置于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的大背景中,进行了整体观察和全面梳理;以“第四次浪潮”的滥觞与潮退、个人化写作和通俗化转向、“双重回归”与“两种失衡”等富于理论新见的概括,生动而清晰地描摹出二十年来军旅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和多重面相;对不同代际、不同身份和性别的作家作品,进行了专章讨论,力求有点有面;阐释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特点优长的同时,对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进行了尖锐中肯的批评与省察。

【关键词】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第四次浪潮”;“双重回归”;“两种失衡”

【作者简介】朱向前,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军优秀教师,现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国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学评论”编委,历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评委,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央电视台主讲嘉宾,已出版《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莫言:诺奖的荣幸》《军旅文学史论》等专著、文论集二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傅逸尘,《解放军报》文艺评论版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著有文学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叙事的嬗变》、理论专著《英雄话语的涅槃》、长篇纪实文学《远航记》、绘本《最美妙的声音》等,编著有《“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以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

【原文出处】《东吴学术》(常熟),2019.4.22~35

【基金项目】本文为朱向前主持的中国军旅文学史(一九四九—二〇一九)课题之部分,该课题获得江西教育出版社支持。

一、从“第四次浪潮”到通俗化转向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军旅长篇小说异军突起,一朝爆发竞势不可挡,收获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井喷式的爆发一方面标示出作品的数量之众,另一方面也蕴含着精品力作涌流的巨大空间。这种数量上的突破构成了丰富立体、繁复盛大的文学景观,彰显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们的创作实力和创造活力。以军旅长篇小说的全面繁荣为标志,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①逶迤而来,“英雄话语”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的文体自觉和文本探索中实现了涅槃。

伴随着强军兴军崭新实践的全面推进,军营文化、军人生活、军旅经验、军人形象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新鲜而重大的变化。处在新军事革命大潮中的

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丰饶繁复的文学面相。军旅长篇小说作家所面对的生活经验异常细碎驳杂,曾经被生活经验与文学观念的“共识”所统摄的“集群性写作”土崩瓦解,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开始以“个人化写作”的立场与姿态展开对军旅题材的新一轮文学想象。

事实上,在当代军旅文学的历史演进中,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非常稀缺。“十七年”军旅长篇小说虽然含有鲜明的作者主体生命经验,但政治话语强力规约了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那部分属于作者个人的思想和体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坛独树一帜,但是集群性的“写作冲锋”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被关注和讨论。在政治色彩浓重的文学生态中,“个

人化写作”是作为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脱节的写作伦理而遭到贬抑和排斥的。事实上，“一呼百应”式的召唤性写作也使得军旅长篇小说的模式化和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进入新世纪，“在商业语境强化和政治语境淡化的双重夹击下，军旅文学也急遽分化，当年‘群体作战’的军旅作家队伍也飞鸟各投林，或通俗化，或影视化，人员流散、斗志涣散，只有少数执著的坚忍者仍在‘商海横流’中显出英雄本色，像滔滔商海中的‘孤岛’一样，岿然耸峙蔚成大家气象”。^②“孤岛”现象的出现，既是“个人化写作”姿态的深化，也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显著标识。

“个人化写作”姿态对以往政治话语主导下的集体文学思维方式的反拨，是基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而对文学本体属性的回归。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可以更自由、更灵活地切入部队当下生活，体验和表达军人情感，透析部队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审视并重构历史时空，思索和前瞻军队发展前景。作家们可以根据各自的知识构成、生活阅历、关注兴趣、跟踪对象和认知角度选取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以个性化的风格和技巧来写作；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强调意义和价值，开掘出新的叙事和表意空间，有效扩展题材边界。稍加梳理便会发现，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涵盖了战争历史、现实生活、婚姻情感、军人伦理、英雄话语等等涉及到军人与军旅生活方方面面的题材领域，且拥有更加独特的观察视界、思考角度和艺术个性，对剧烈变革和转型中的部队生活进行了更加及时而深刻的反映和探索。许多原先被一体化文学思维所遮蔽过滤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中得以更好的发掘和表现。军旅女作家和“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崛起更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开辟了新鲜且可持续发展的生长点，也使得作品更加贴近当今时代和部队现实。

整体而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由突出经验到侧重体验，由反映生活到想象存在，由追求宏大主题到凸显语言张力，既往僵化单一的文学观念被彻底突破；同时，史诗情结并未完全消散，它以哲学化、历史化、个人化而非“意识形态化”的形式继续演

绎着历史、社会和时代风云，并在军旅长篇小说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军营走向市场，从精英走向大众，从整一走向多元，从焦虑走向自信，从边缘走向中心，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关注度。随着现实主义的深化，人道主义的强化，以及人本观念的确立，军旅长篇小说对人性和灵魂的关注，对军人精神和心理空间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英雄观念和审美范式亦呈现为多样化的主题变奏。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严肃文学在市场的推动与刺激下，被动地完成了历史转型，与大众文化之间曾经不可逾越的鸿沟被填平。无论是就作家心态、写作立场而言，还是从文学营销策略、小说叙事方式来看，面向市场、走向市场都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二〇〇五年，以电视剧《亮剑》在全国范围内热播和《历史的天空》折桂茅盾文学奖为标志，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迎来了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或曰分水岭。此前的军旅长篇小说聚力于形式探索和技术实验，文体意识的自觉性和文学性探索的深广度较之以往都显著提高。而此后的军旅长篇小说开始了“通俗化转向”，并越来越多地显露出类型化文学的审美特征。市场这支隐形巨手的全方位介入与高强度参与，带来了小说语言、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生活呈现、思想表达等诸多层面的变化，并深刻影响了作家的文体意识和写作伦理。文学生态的剧变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变革前行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毫无疑问，文学生态的剧变是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基点。大众文化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最重要、最核心的文学生态属性。置身其中，接受重新塑形，返身又参与到大众文化自身的建构当中，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已成为当下大众文化最为重要的标签和组成部分。而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无论是小说文本的畅销还是改编电视剧的热播)之所以在当下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正是得益于大众的热烈追捧和深度参与。当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接受渠道、审美风格和评价标准都发生了偏移，当市场和读者都在共同打造时代的

宠儿——畅销文学时,军旅长篇小说也开始在军旅属性、个性风格以及读者趣味三者之间寻找新的交叉与平衡。

与市场(商业出版)接轨、与媒体(电视剧改编和网络写作)联姻,使得军旅长篇小说最大限度地收获了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扩大了影响力,弘扬了主旋律;但同时也斫伤了作家的文学感觉和审美判断。正像朱向前所担忧的:“纯文学创作讲究意境、氛围、心理刻画、环境描写、性格塑造等等。当然,电视剧也有语言要求,比如人物对话要精彩,但那更多是为了情节展开,交代故事,设计悬念,要一环扣一环;而纯文学写作又可能重在心灵挖掘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严重一点说,长期的电视剧写作对作家可能是有害的,最终导致对作家个人品质和艺术才华的腐蚀。有的作家说他先写几部电视剧赚些钱,然后再安心写小说,美其名曰‘以文养文’,这其实是自欺欺人。一旦尝到了电视剧甜头是很难收手的,只会越走越远、越陷越深。”^③以纯文学的角度观之,高度的“类型化”对于军旅长篇小说而言是一把不得不警惕的“双刃剑”。因而,全面提升军旅长篇小说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也便成为了“通俗化转向”进程中军旅长篇小说作家需要省思且无法规避的重要课题。

二、老作家徐怀中、彭荆风的军旅长篇小说

文学创作伊始,徐怀中先生就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和一九八一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西线轶事》是他的代表作,但这两部在军旅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作品都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这当然和他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旨趣有关。按徐怀中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喜欢孙犁的作品与风格的,甚至每次写小说前,都要将孙犁的作品找出来读一读,感受一下他那既生活化又唯美抒情的语言和细节。也就是说,他的文风属于孙犁的“荷花淀派”这一脉。

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牵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里,徐怀中先生更是将这一文学风格发展到了极致。细腻入微的写实笔触、浪漫奇崛的历史想象共同建构起一个“有情”的世界。小说浓墨重彩书写的是战争背面的景致,是对悲剧美学

的深入探索。人性的高洁与卑下、英雄与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种自然色彩的交织与缠绕,托举出战争背面的别样风情与生命剪影。

《牵风记》将知识分子的形象置于前景,处处凸显文化的力量。女主人公汪可逾出身于北平一个颇有名望的书法世家。小说中,她的出场本身就是很神奇的。她的突然出现,挽救了一场本已尴尬结束的慰问演出。齐竞与汪可逾在黑暗的舞台上探讨古琴演奏技法和相关问题,这本身也是奇景,显露出齐竞这位解放军指挥员不同寻常的精英文化背景。古琴,既是物的存在,也是精神与灵魂的外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设置看似有违日常生活经验,但却将文化的魅力烘托到了极致,小说的精英底色、优雅气质由此铺展开来。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鲜有浓墨重彩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作品。《牵风记》对战争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对他们心理和灵魂的深刻解析,将文化、教养之于战争、军队、社会和人的意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怀中先生呼唤并倾力建构战争文学中的审美存在,敞开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印证了一种新的叙事逻辑。他念兹在兹的正是文化的力量,是那种超越战争甚至超越时空、直抵人心的审美魅力。

在极致的审美之外,小说中还有审丑的向度,而审丑正是《牵风记》的批判性之所在。只有与丑相对照,美才能更加清晰地被确认。齐竞内心深处对女性贞操的执念是一种丑,对汪可逾造成的迫害和他极度自私的心性是一种丑,甚至已经成为恶。小说对曹水儿风流“丑行”的正视虽然也是一种审丑,但却反衬出了历史的乖谬和人性的光芒。美与丑同样需要审视,这种审视的立场源出作家的目光、胸怀和思想。事实上,无论是审美还是审丑,都互为镜像,在彼此的观照中迸发出了惊人的精神力量。

美与丑,在战争中都要经历最严苛的考验,这关乎理想主义的美能否最终超越战争,生命的伟力能否得以张扬,文化或曰文明之美的种子能否被珍惜和保存下来。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无论美丑,最终都没能逃脱毁灭的命运。这种幽微、尖利的痛感使得小说的主题更加复杂、深刻。小说主题层面的

复杂和多义,与徐怀中先生的哲学思辨和超越意向密不可分。《牵风记》的故事并不复杂,矛盾冲突也谈不上多么激烈而跌宕,字数亦不算多,却写出了大河般辽阔辽远的感觉,显露出硕大丰沛的精神容量。这是一个承载着理想主义精神的叙事文本,是一种对生命自然之美的浪漫想象,是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新的建构。

彭荆风的文学创作生涯很长,几与整个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相当,在各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优秀的有影响力的作品。长篇小说《太阳升起》(作家出版社,二〇一八年)虽然是彭荆风的遗作,但作家生前已经对书稿修改完毕,因而小说得以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太阳升起》是一本用文学方式描述特殊的边地、特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书。彭荆风走遍了西盟佤山的大小部落和山林,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佤山的自然风貌了然于胸,对佤族、拉祜族那些古老而独特的风俗了解至深。这些使得他的作品能够贴近所书写对象的心灵,也因此能够给读者带来似可触摸的真切体验。让读者重新回顾佤族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起点,回望那艰难曲折的前进道路,倾听佤族人民进步史诗中的交响乐章。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套完整、独立而且稳定的文学传统和价值观,离不开老一辈军旅作家对英雄精神的坚守和对美的不懈追求。他们所思考的、所书写和表达的都是比较广阔、重大的史诗性的题材,传递出来的是比较高蹈深邃的思想,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个人化风格。彭荆风把那一段特殊年代下的、特殊的历史事件重新打捞起来,同时又经过漫长岁月的淘洗和磨砺,沉淀下来的生活和故事都是经过精心剪裁的。小说写了许多生动的细节,不是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很难写出这些细节。没有冗余的段落和多余的对话,文字里弥漫着深沉的现实主义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彭荆风始终坚守写实的传统,同时具有高超的写实能力。在此基础上,又有对美的强烈追求、对爱、善意、温暖等美好精神的持续而深刻的表达。从小说中的众多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对自由、对美、对人的尊严、甚至是

对生命乐趣的探索 and 发现,这一点恰恰颠覆了人们对于军旅文学的刻板印象。

就小说所表现的重大主题、历史转折、众多人物和生活幅面而言,《太阳升起》无疑具有史诗的气质。然而,不同于通常史诗小说巨大的时间跨度,《太阳升起》的叙事时间只有几天。彭荆风在几天时间里,浓缩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交织了多重矛盾,写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这是作家积淀多年、几经修改、融会了作家数十年创作经验的一部作品。清新简练的文笔以及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给读者带来了非常愉悦的阅读感受。

三、朱秀海、徐贵祥、周大新等的军旅长篇小说

朱秀海是一位对战争有着丰富生活积淀和深度生命体验的作家,在一九九五年推出的《穿越死亡》中,他曾对战争环境下人的心理空间做出了精准把握和深度开掘。到了《音乐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二年),朱秀海更加着力探索残酷的战争、严苛的环境与人的感官世界和精神空间的关联。

《音乐会》并未展开宏大的战争历史叙事,转而以个体性的主观视角聚焦微观的战场环境与独异的生命体验。幻听症使得金英子对战争的感受迥异于常人,枪炮声和音乐的节奏旋律在这个朝鲜孤女的灵魂经验中完成了转化和统一,因而具有了某种富含生命主体性的象征意义。音乐会的演奏与战争的进程相互穿插,经由少女视角和病态感受而融合为一种极具结构张力的复调叙事。个人想象和感官幻象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作者通过这种浪漫写意的方式对战争与和平、博爱与人性、生存与死亡等等一系列终极问题展开了新鲜的想象。朱秀海以采访记录的方式将金英子的回忆即主体故事情节人为地分割成若干章节,在其间插入采访记者马路的日记和给局长的报告等非叙述文字,而在金英子的回忆过程中也会经常插入作者的提问和与金英子的简短对话,这种结构方式极大地延缓了叙事的速度。此外,《音乐会》的语言也富有特色。大量附加性、修饰性语词的使用,延缓了故事情节的推进速度。那种汪洋恣肆的膨胀感使得小说语言具备了独立的审美个性,甚至使得整部作品带有了狂欢化

的哲学意味。不同于以往战争历史长篇小说对“胜利大团圆”模式的激昂表达,朱秀海在对战争悲剧本质的探求和对沉郁悲壮的美学风格的建构上取得了突破。

徐贵祥在二〇〇〇年后接连推出了《历史的天空》(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明天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八月桂花遍地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高地》(长江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特务连》(作家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四面八方》(安徽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马上天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对阵》(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等八部长篇小说,在反映战争历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与直面部队现实(和平年代军营生活、新军事革命实践)这两个向度上都进行了富于个性风格的探索。

英雄话语的构建作为中国当代军旅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叙事资源,早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言说方式。然而长久以来,军旅长篇小说的英雄观念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渐趋僵化和狭隘,因而广受诟病。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长篇小说对英雄形象的塑造由理想化逐渐向人性化回归,英雄叙事呈现出一个由理想化书写到本色书写,再到另类书写的嬗变过程,由此也将人性的发现、个性的张扬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历史的天空》中,主人公梁大牙以原生状态登场,宛若“赤子”般,保留着生命的原始野性。他身上既有农民的狭隘和狡黠,又有出身草莽的粗鄙和匪性,由于历史的偶然性,阴差阳错地参加了革命,其动机不但没有半点革命者的味道,甚至是背道而驰。他行事乖张,甚至有时候很离谱;他个性张扬,甚至连军纪都无法约束;他思想大胆,甚至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就是这样一个在自身人格、思想认识和革命觉悟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缺陷的“另类”英雄,在爱情的引领下,经受住了战火的洗礼和政治运动的考验,完成了灵魂的洗礼和人格的升华,最终脱颖而出,化蛹成蝶。不同于传统的英雄形象,“另类”英雄是人格个性过度放大了之后的英雄。梁大牙参加革命虽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英雄不问来路”,这可以说是新世纪军旅长篇

小说英雄观念的重要突破。

徐贵祥站在个人化叙事立场上重新展开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和想象,将人物置于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探寻个体生命不断成熟和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从“梁大牙”到“梁必达”,作家深入到历史的深处与细部,聚焦于错综复杂的人性欲望与人际纠葛,书写个人在命运失控状态下的茫然与无助,细腻展示了个体生命在变幻莫测的历史漩涡中的成长轨迹,进而将“历史的天空”遮掩下的各色人等驳杂的人性欲望充分挖掘出来,并对历史本体的外在偶然性和内在合理性,进行了“自我型塑”和主观化阐释。这种历史叙事理念一方面植根于作家“当下”的生存体验,一方面来源于创作主体对历史的多元性、复杂性和虚构性的个人化“理解”。徐贵祥突破了陈旧狭隘的英雄观念,并对战争形态的悲剧本质的本质以及战争所包含的诸如复杂人性和多元价值判断等等深层问题做出了新思考和新探索。

周大新的小说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都是融悲悯的情怀、文体的自觉和温暖的笔触于一身。当读到《预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九年)时,笔者感觉眼前一亮。原因就在于:周大新大胆地选择了以鲜见的“反恐”视角切入军旅现实生活,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开辟了“反恐”这一新的题材生长点;迥异于时下流行的谍战小说以编织故事为本位的类型化叙事伦理,周大新坚定地回归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倾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新世纪军旅文坛留下了“孔德武”这一独特而重要的人物形象;周大新以忧患之心直面欲望与理性的冲突,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军人的精神世界发出了双重“预警”,显示出高度的思辨性和概括力。

周大新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对当下军营的现实图景、军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原汁原味的扎实描摹,对孔德武内心世界的震动与变化、矛盾与挣扎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腻刻画。在波澜不惊的叙事之中,积蓄着撼人心魄的力量。小说的书名“预警”极富象征意义,既作为孔德武撰写的理论专著的主题隐喻着新军事变革实践的召唤,又作为理性与欲望冲突所引发的道德拷问纠结于孔德武的精神世界,更因

其表征和揭示了时代的病症而弥漫于广阔的现实空间。周大新通过孔德武不无悲剧色彩的个人命运和包蕴英雄壮举的小说结局,对当今时代和军旅经验做出了细腻的书写、精准的概括和极富思想高度的超越,更以军旅作家的使命担当向全社会发出了一声振聋发聩的“预警”。

歌兑的《坼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在全景式还原抗震救灾现场的同时,又在文学之外延伸出一派洞察世事的哲学观和存在感。“坼裂”作为贯穿全篇的关键词,其背后的文学意涵尤其值得玩味。

首先关乎身体:无论是女军人,女护士,还是女性雕塑,都是带有裂痕的。地震来了,女性雕塑从胸部裂开一道缝,卿爽原本洁白无瑕的身体在救灾中变得伤痕累累;护士长伤痕的设置具有某种荒诞感,她的胸是假的,并且是误诊切掉的,这可以理解成更隐形的裂痕;更有地震时为护住丈夫而流产大出血死去的新娘、不得已被直接剖切的孕妇老师、要去找孩子而自断手臂的农村妇女、在截肢与保命间哭泣的女孩……很多裂痕均是藉由女性的身体阐释的,在营造了勇于承受伤痛的母性壮美感的同时,反复强化了崇高的人类生命繁衍主题。其次是心理上的“坼裂”。从一开场,男女主人公一方面是带着心理上的现代病的被救赎者,另一方面又是无数灾民赖以求生的救赎者。他们和灾难是互生互存关系,于是,才让人们剥离灾难反思人性庸常的一面。作者不但写到了人体、精神和大自然的裂痕,并且阐释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作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独特的审美追求。

在一个主观倾向占上风的文学时代,我们通常很难读到像生活一样真实、鲜活、饱满的客观性作品。于是乎,精确和真实也便成为极为稀缺的叙事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客观性、形象性和真实性正是优秀小说的显著特征。在王凯的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七年)中,我们不仅能读到对沙漠天气、风物及环境的精确、优美的描写,还能清楚地看到人物的外貌、行动、言谈和性格,连同他们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同样精确而

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说,小说家在作品中成功地表现深刻的主题内容和博大的思想情感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那么,追求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效果,就难上加难。因为,要写出客观性的作品,需要作者花费更多的心力,需要足够的耐心进行认真的观察、冷静的分析和慎重的判断。“王凯有着扎实完整的部队任职履历,他对基层与机关生活的体验可谓丰厚而深切。因此,王凯的小说善于挖掘、表现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的生命情态和驳杂的心灵世界,对年轻一代官兵在军营与社会的急速变化中所面临的各种尴尬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王凯都在小说中进行了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意味的追问与批判。”^④

四、麦家、都梁、邓一光、刘醒龙等非军旅作家的军旅长篇小说

从《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到《暗算》(世界知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再到《风声》(南海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麦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别开生面,另辟蹊径,其本人也被誉为中国“新智力小说”或“特情小说”的开创者。麦家的小说具有一种罕见的“惊奇感”,而这种“惊奇感”恰恰是当下的中国文学所极为稀缺的。

小说作为一种倚重和表呈想象力的虚构文体,进入新世纪以来却渐趋单调乏味。鲜见凸显个性风格的叙事语言,缺乏活色生香的感官世界,为读者创造“惊奇感”的能力正在快速下降。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作家编织故事的功夫最强,塑造人物的能力次之,而对“人”的书写却最为孱弱。当创作主体无法摆脱日常经验的圈限,当作品中普遍弥漫着作家私我的焦虑,人之为人的本质世界便被忽略甚至遮蔽掉了,小说也便没有了“惊奇感”。而麦家的独异之处恰在于,他的叙事始终围绕着“人”来展开,探寻人物的命运,追究心灵的隐秘,想象生命的可能。麦家对生命存在和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孔武有力,他试图窥破生命的秘密,揭示命运的本源,进而求得精神的解放并达至灵魂的自由。这种沉入生命而又超越肉身的写作伦理在新世纪中国文坛可谓独树一帜,这种对未知世界的发现和对生命“存在”的重审

亦刷新了读者的经验,给人以惊奇、异样、华丽但却不失庄严、深沉、壮美的丰赡而立体的审美感受。

《解密》中的容金珍性格孤僻冷漠、命运幽深莫测。《暗算》抓住了人的欲望的不可遏制来写天才人物的悲剧命运。瞎子阿炳“耳力”神奇,能够搜索出难以辨别的敌台密码,却也能听出自己家庭内部的隐秘。黄依依具有超强的数学计算能力,却因桃色事件意外丧命。《风声》将绝望浓缩在一个狭小的环境中,将战争、杀戮、陷害等对人伦秩序、生命意志的冲击力表现得触目惊心。《解密》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结构上虽以“起承转合”来命名,但那更多的是对人物命运走向的一种概括。事实上,小说聚焦的是人本身,对密码背后的权力争斗、人性考验进行了重点描写。麦家并不满足于解密特情部门的日常工作,或是书写容金珍的传奇人生,他的叙事野心在于要揭穿一种悲剧性的人类生存,以及这种生存的宿命本质。小说所审视和质询的不是现实中实在的东西,而是人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以富于智性的叙事搭建文学性与可读性之间的桥梁,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主流的思想和价值,麦家的探索和实践无疑是成功的,但也存在着显明的问题。《风声》之后,麦家小说的叙事,已难以逆转地走向了僵化和模式化。创作主体写作伦理的转型在因应大众消费潮流的同时,也消弭并瓦解了曾经强烈的文学性追求和先锋性姿态。

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与消费性大众阅读的有效接驳,早在二〇〇〇年,都梁推出长篇小说《亮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时便开启了。都梁曾在军旅,转业后又有着成功的经商履历,熟悉军队和军人生活,又深谙市场运作。这使得他一出手就切中了军旅长篇小说跨世纪转型的脉搏,打造出一部兼具可读性、可视性与政治性的通俗文本。

都梁自觉运用了蒙太奇的叙事方式,同时展开大量的对话和心理描写,集中烘托和打造“亮剑精神”这个核心主题。所谓的“亮剑精神”——“明知不敌,也要亮剑”既含有深刻的悲剧意识,又兼具心灵鸡汤的功用。《亮剑》的小说文本内部糅合了多种叙事元素,成功融合了军旅题材的主题表达与通俗小

说的叙事方法,追求一种顺畅无障碍的阅读快感,因而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审美趣味,堪称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通俗化转向的突围之作。然而,我以为《亮剑》的文学史意义还不仅限于此,更在于都梁通过对英雄形格的独特塑造,达成了对中国当代文学中既有“英雄话语”传统的更新和拓展。这种重建首先源于作者对“英雄”观念的重新体认和阐释上。英雄,不但应该具有顽强的意志和过人的胆识,还应该具有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这是作者力图表达的重要内容。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田雨和母亲沈丹虹的对话,从宽泛的文化意义上对“英雄”一词做了界定,更以主人公的形象和行动为新的“英雄话语”作了注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李云龙虽然具有英雄的举止,也具有英雄的秉性,但还不能说他就是一个英雄,因为他还不具备英雄的精神气质。为了活命而走向革命队伍的李云龙,身上具有农民的质朴与狡猾,却缺乏对革命的自觉且理性的认识。尽管解放后他娶了年轻貌美且书卷气十足的妻子,但他的内心深处却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言行举止中他思维与个性上的偏狭亦表露无遗。有鉴于此,李云龙最终对死亡的自觉选择不单达成了“英雄性”向“英雄精神”的升华,也凸显了《亮剑》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与外力强加的生命悲剧不同,都梁让他笔下的人物自觉地走向毁灭。与生命的陨灭相伴相随的,是英雄精神的超越和升华。李云龙是在以死来肯定生,张扬着生命的高贵与尊严。《亮剑》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的英雄悲剧,与英雄生命的毁灭相伴而生的不是凄美与悲怆,而是崇高与壮美的美学效果。

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北京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我是太阳》的拓展和深化。同样是张扬英雄精神,书写父子故事,然而经过十年沉淀,邓一光再出手时,小说叙事的向度和意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对父辈英雄传奇的叙写,转到了对“自我”主体的成长性建构。

在动荡的历史进程和难以掌控的命运沉浮中,邓一光试图建构一种抗争与不屈的英雄主义——一种在迷茫中冲撞、在沉沦中崛起、在彷徨中觉醒、在毁灭中涅槃的富于超越性的英雄主义。《我是我的

神》集中塑造了以乌力天赫、乌力天扬为代表的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人物群像,呈现了他们从迷茫、混乱到觉悟、抗争并最终走向成熟的过程,以及从这一复杂的精神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芒。在《我是我的神》中,父亲的暴虐和儿子的叛逆在特定的年代彼此砥砺,那一条英雄的血脉因此而得到了奇特的延续。乌力天赫被深深的内心隐痛煎熬得苦不堪言。他想战胜成长道路上那些看到和看不到的对手,他想毁掉这个令他痛恨的世界。于是,他不再与父亲纠缠,选择了离家出走并且永不言归,在战争的极端环境中反思自己的灵魂,并逐渐进入更为深邃、高远的哲学层面审视人类生存的境遇和对自由的向往。通过超越肉体苦乐的灵魂求索,乌力天赫最终完成了“自我”的成长与“主体”的建构——“我是我的神”。相比起乌力天赫,乌力天扬在世俗的境遇中,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体现出了更强的责任感和英雄色彩,他所寻觅的是一条经由生活本体而达至独立人格的完善之路。从战场上凯旋归来,他本可以开始相对稳定、顺利的人生。但是,面对失去生命、身体残缺的战友,面对破败的家庭,他选择了与残酷的生活现实抗争,在一次又一次挫折中,他从未放弃、从未止歇,从未想到为个人谋求利益。经历了文革的混乱、战争的伤痛和改革开放的躁动,乌力天扬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和人生,成为一个勇于承担生活责任的成熟男人,以一种平凡但却富于理想情怀的英雄主义精神完成了灵魂的救赎,在“父亲”即将去世时达到了“自我”的升华。

邓一光试图建构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精神在宏阔时代和庸常生活之间觉醒、挣扎、存续、自证的历史,也是英雄主义持续滋养并升华的心灵史和成长史。

刘醒龙耗时六年创作了长达一百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圣天门口》(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小说以武汉附近的天门口小镇为切入点,围绕着雪、杭两家的恩怨情仇,围绕着红军与白军、与日寇的存亡之战,对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行了一番个人化的另类讲述。刘醒龙将宗教的力量引入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叙事中,借助于博爱、宽容、自省的宗

教意识来提升和救赎人性的泯灭和灵魂的迷失,赋予生命和生存以尊严,更赋予历史以超越性的精神向度。

小说从故事的层面来说充满了血腥与暴力,人的生命在特定的战争背景和历史时刻是那样的脆弱而无助,势同蝼蚁。但是,作家却并未正面描写战争与杀戮,而是将之虚化,借助于女性的平和与坚韧,借助于情欲的温暖和柔软,填补了革命暴力和权、利争夺而形成的人性裂隙。梅外公、梅外婆、雪柠、柳子墨等主要人物被赋予了神性,似乎有些天赋异禀,与世俗的生活场域和价值判断格格不入。梅外婆和雪柠作为主要人物被施以浓墨重彩,二人的心灵世界和思想过程被夸张和放大,并且自成体系,构成主体故事情节之外另一重故事空间。作者将对人物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空间的探微提升至和主体故事情节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和辅助心理叙事就割裂甚至淹没了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这种叙事结构不一定很讨巧,但却显得另类而有效,它的直接叙事效果就是将宗教神性对人性的提升和救赎这一主题,将中西方文明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中的碰撞这一独特视角诗性而从容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家这种自觉而深刻的历史意识、不拘泥于故事层面的超越性叙事构成了作品厚重但却不失灵动的主题表达。

当前的小说家普遍太务实了,而小说最迷人、最有价值、最符合小说本性的所在恰恰是“虚”的地方。《圣天门口》所呈现出的不仅是一段关乎革命与战争历史的宏大叙述,更是一场场奇崛而瑰丽的浪漫爱情,小说所营构的不仅是围绕家族恩怨情仇而衍生的动人故事,更是一个由诗性语言、细腻情感、诡异氛围、奇幻风物搭建起来的“文学性”王国。作者对逝去历史的挽歌式书写与对残酷的现实生活富于超越性的价值判断,建构起了一种经由文学而至哲学,经由人性而通达神性的文学路径,同时也将中国现代小说的写意传统发挥到了极致。

肖亦农的《穹庐》(作家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取材于一百年前布里亚特草原蒙古部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背景下誓死保卫部族和最终东归

祖国的宏大历史事件,它超越了一国、一党、一阶级、一族群的立场,也超越了我们惯常的思维模式,表现了一种更为宽阔、博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穹庐》堪称中国版的《静静的顿河》,作家始终以文学的、艺术的、人道的、人性的标准来塑造人物,来讲述故事。作品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浓郁:首先是人物的对话,如嘎尔迪老爹的语言,特色十分鲜明,既深深地浸淫着内蒙古的文化汁液,又非常符合人物个性、人物身份和人物教养,符合此时此地的情境。其次是风物描写。全书起码有不少于二十段对草原地理地貌的细腻描述,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时辰,或是主人公的不同心境,小说对草原风貌的呈现都不雷同,没有几十年的细致观察,作家是不可能有这么丰富多彩的发现的。嘎尔迪老爹作为一个生长在大草原上的汉子,围绕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小说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人性、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对人生和未来的希冀与期盼。文化自信是更深厚、更广泛、更持久的自信,如果作品能在文化认同、文化底蕴的角度上再多着些笔墨,更加细腻充分地展开文化的深刻影响,比如嘎尔迪老爹对满清二品官服和其表征的文化的留恋与向往,那么这种回归祖国的原动力就会更大、更强、更具说服力。

在既有的对军旅长篇小说的理解模式中,我们已经难以看到新鲜的经验、新鲜的感觉、新鲜的认知,而只有在那些突破既定模式的新的写作方式与新的艺术形式中,我们才能看到新的生活与审美经验。恰恰在这个意义上,非军旅作家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因为跳开题材的限制而更加专注于文学资源的开掘,因为少了观念的羁绊而显露出突破既往的新意,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

五、马晓丽、王海鸰、刘宏伟、文清丽等女作家的军旅长篇小说

不同于男性作家对战争历史和军旅生活的正面强攻,女作家们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往往会较多地从侧面切入军人的婚姻和情感生活,探索军人心灵和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作品普遍格调清

新、文字优美、感情充沛而又略带感伤色彩,立意和主旨往往直指人性和灵魂的至深、至柔之处,具有较强的艺术和情绪感染力。

马晓丽的《楚河汉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兼具语言的细腻和思想的力量,通过主人公周汉的灵魂视角游走于历史与现实时空之间,经由缠绕纠结、回环往复的叙事打通了战争年代与平时时期,深刻解析了多层次多向度的矛盾对立。小说的结构设计十分精巧,周汉昏迷之后,进入了纯意识的回忆和想象。这样,一方面可以回溯历史,超越现实语境的价值判断,以历史老人审视的目光对现实进行关照;另一方面,前史的叙事线索的展开,历史空间的架构也与现实世界形成了对立。周汉曾经面临的历史困境在现实世界中、在自己儿子的身上重演,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暗合实际上生发出了新的矛盾,历史和现实的两难困境在不同时代人的心灵世界构成了尖锐对立。在这里,现实对历史构成了审判性的关照。

从故事层面来看,周东进和魏明坤围绕着“职场升迁”和个人进步的明争暗斗贯穿了小说情节的始终。周东进作为周汉的儿子,其骨子里继承了父亲正直顽强的个性,他作为部队高干子弟的特殊家庭背景和与生俱来的浪漫特质使其有了一种绝对的纯粹化的理想主义的职业军人情结,他对“军人”的理解是纯粹的、崇高的,无法容忍它受到污染;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这种纯粹的个人化的理想则处处碰壁,时常使其陷入现实与内心的两难境地。归根结底,他的这种刚烈耿直的个性和他的价值观念中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纯粹化、理想化的理解是与现实语境下世俗观念的强力相排斥的,是与这种世俗的话语言说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相矛盾的。在现实生活这个五颜六色的大染缸里,“一尘不染”的他是那么格格不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周东进这一人物被赋予了一种浪漫主义悲剧色彩,而其理想更是无从实现。魏明坤这一人物的设置明显带有作者的主观意图,他出身于平民阶层,和军队大院一墙之隔,从小和周东进等部队高干子弟一起长大。他始终把周东进作为自己的对手与假想敌,试图超

越他。然而,在他与周东进贯穿了全篇的对抗竞争中,丝毫看不出他人性中闪耀的光辉与人格魅力。在小说中他似乎是作为周东进的影子而存在,其人生目的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要超过周东进,二要改变个人卑微的社会地位。军人家庭生活条件的优越,高干子弟的凌驾于平民子弟之上的傲慢与轻狂对于魏明坤幼小的心灵来说,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与巨大的刺激。对军人子弟的态度也由羡慕转为嫉妒,进而深化为一种改变个人命运,超越以周东进为首的军人子弟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通过努力,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最终在官职上超越了周东进;而在精神世界里,从周汉到周东进,他们的崇高人格和精神境界始终是魏明坤视野内的一座高山,必须仰望而又无法超越。在这场对抗中,周东进与魏明坤都显示了个性与人格的复杂性,由于隐含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对立,判断谁胜谁负是很困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精神旗帜的高扬和人格丰碑的屹立更显得弥足珍贵。

王海鸰被誉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写感情自是其拿手好戏,但真正书写军人情感和生活在她的创作中却并不多见。在《大校的女儿》(作家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中,王海鸰站在女性立场上,以敏感纤细的细节描写,家常般熨帖的叙述语气,扎实深厚的生活经验,鲜活而又富有哲思的生命体验,塑造了一个生动丰满、独具个性魅力的“女人”形象。以往的军旅文学大多是有意识地遮蔽了女军人的性别意义,作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点缀,突出她们的青春、美丽、活泼、可爱的一面。《大校的女儿》彻底颠覆了这种暴露在男性欲望与审视目光之下的女性书写模式,王海鸰从女性生命经验出发,耐心而冷静地书写了韩琳从女孩到女人成长的全过程,通过对女军官“韩琳”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抽丝剥茧般的描写,细腻展现了一个首先是“女人”,其次是一个“女军人”的生活状态,建构起一段当代女性军人的心灵史。

这是一种女性意识自觉的写作,但并非是一种“女性主义”式的写作,小说对男性人物丝毫没有贬损、拒斥和嘲弄,反而充溢着理解和包容的美好情

感,堪称绝妙。彭湛是一个外形俊朗、棱角分明、个性鲜明的男人,但其精神世界却一片混沌,对外在世界无力理解,对内在世界无力控制,这样的男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谓不多矣,但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如此准确、到位的却并不多见。女主人公韩琳敏感脆弱,自负且自我,对生活有着足够的感受能力和悟性,对爱情怀有理想主义情结,既渴望、幻想又矜持、焦虑。王海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陈这是一部自叙传,有着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作家凝望、记录并刻画了女主人公,也塑造了创作主体自身。相较于男性作家,女作家在军旅作家群体中处于数量上的绝对劣势,在“影响的焦虑”之下,和男性作家比着搞宏大叙事,因而女性意识向来比较淡漠。而《大校的女儿》恰恰显示出王海鸰鲜明而坚定的女性写作立场,以娓娓道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故事,以大量触手可及、贴近日常生活经验的细节支撑起作品,剔除了主题性的意识形态负载,代之以融合了女性生命痛感、人生体悟的形而上思考,建构起一个较为纯粹、具有本体意义的“女性军人经验”的叙事文本。

刘宏伟是军旅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擅长驾驭宏大的题材,除了女作家特有的柔软与纤细之外,亦不缺乏力量。《大断裂》(长征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可以说是耗费刘宏伟心血最多,也最有分量的作品。她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深入系统地研究与地震相关的科技和专业问题,几乎成为一个地震问题的“专家”了,在当今“快餐化写作”成风的背景下,能如此严肃、认真、扎实、深入、细致地写作十分难得。在《大断裂》中,刘宏伟着力显露出笔力上阳刚与雄健的一面。在那些有关大场面的描述中,在那些对于历史事件、历史氛围的概略性描述中,她表现出了与宏大叙事这类小说结构相得益彰的语言驾驭能力。她追求一种从容沉稳的叙述风格,不急着直奔故事、直爆情节,常常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对景色、物体、氛围、场面进行冷静而精细的描摹,其中不乏诗歌所特有的奇诡意象和修饰语法。小说是以当年唐山大地震为背景的,出版后却正好赶上了汶川大地震,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广泛关注。《大断

裂》是刘宏伟多年来不断跋涉,自我提升结出的果实,也体现了刘宏伟作为一个军旅作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刘静曾经以一部中篇小说《父母爱情》令文坛刮目相看。长篇小说《戎装女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除了保持了作家一贯的犀利、俏皮、幽默、机智的语言风格之外,更强化了对现实的介入力度和对军旅生活的思考深度。刘静在小说中着力塑造了一位优秀的“戎装女人”——吕师。《戎装女人》重点对和平年代女性军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度刻画,同时又以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勾勒出一个充斥着男性本位主义和性别观念的男权世界。通过吕师身边的男同事们有个性而又有深意的话语,通过人物之间的心灵交流和性格碰撞,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军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刘静着力于对各类人物形象的心理描画与情感捕捉,因之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很丰富饱满。然而刘静对于官场生态的描摹和把握还不够精准,正像朱向前所分析的:“作家的个性和人物的个性是统一的,作家在书中扮演了一个本色演员,而且扮演得很到位。由于作家本人缺乏领导岗位的历练,也使得人物的领导角色的显得有些浪漫失真,而且分量不足”^⑤。

王秋燕的《向天倾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八年)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情感挽歌,一部女性情感成长和成熟的心灵史诗。小说聚焦一位女航天气象工作者的事业、情感、婚姻和家庭,反映了航天人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隐秘。物欲横流的年代里,纯洁、真挚、矢志不渝,带有浓烈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气质的爱情因为稀缺而更显得无比可贵。《向天倾诉》对纯真爱情的期冀、珍惜、经营和坚持,在军营特殊的环境中显得艰难而曲折,对于苏晴这样一个工作在特殊战线、承担着极端重要且繁重责任的女性军人来说,这种精神恋爱无疑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最后主人公以生命的消逝印证了对爱情的忠诚,不能不说是一出悲剧。作者以闪回和追忆的手法,从女主人公的视点出发,梳理其对人生、事业、情感和命运的选择。其实在每一个关键的人生节点,苏晴原本都可以做出更加符合世俗价值判断

且更加容易的选择,但她的超凡脱俗、她的偏执和理想主义都使她注定将要跨进命运的窄门,将生命融入对事业、职责、使命的忠诚和对理想爱情的永恒追求。

文清丽的小说或浪漫唯美,透着小家碧玉的青涩;或热血沸腾,家国情怀贯穿始终。既有女作家的温情,也饱含思辨的力量。在《爱情底片》(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一八年)中,文清丽以女性特有的感性,抒发了一种难以遏抑的怀旧意绪,亦建构起对混沌难明的一九九〇年代的某种隐喻。小说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女主人公汪哲的情爱故事。通过汪哲的一封封书信和日记,我们看到了她内心深处的纠结与波动,在喧嚣浮躁的校园中也有过迷失与艰难的抉择。“不完美”的人性弱点,更烘托出坚守爱情的可贵与崇高,读之令人唏嘘感喟。文清丽完全写进去了,沉入作品之中,将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体验完全地注入在人物身上,小说也因之具有了一种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力量。

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关于军旅生活的描写。在远离闹市的部队营区,生活着一群生气勃勃的军人,还有他们可爱的来队军嫂们。生活虽然平淡质朴,但那单纯而温情的日子,宛若悠远的笛声,把家长里短和真挚情感撩拨得生动起来。既烘托了军营生活的美好,又给作者自己和读者以期许,相信世间总有一处纯净的天空,留得下所有清澈的想象。为了让人物更加真实饱满,文清丽采用了一种讨巧却也恰切的方式——用主人公的作品、书信和日记剖析其复杂的情感和烦乱的思绪,隐晦的留白和零星的信息埋下层层伏笔;用“会议记录”和“处理决定”揭开面具背后隐藏的人性,反衬出主人公的纯真品性;引用不同人前后矛盾的说法,检视“社会底片”下的芸芸众生。特别是通过汪哲与张家伦各自的书信与日记,窥见主人公无法吐露出来的那些隐秘的情愫。在《爱情底片》中可以看到,文清丽的价值判断是逆向的,她所要建构的是一个关于军人、关于知识分子灵魂内省、关于时代精神批判的寓言。这则寓言故事中饱含纠结与困顿、失落与无助、决绝与彻悟等等哲学层面的思辨。

军旅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女性军人的书写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看都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直到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女性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崛起,对女性军人形象的主体塑造和女性军人经验的正面表达才开始引发文坛的关注。女性作家们不再仅仅以战争为背景展开对女性命运的书写,而是秉承着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不断探索女性军人独特的生命和情感体验,把女性军人内心世界刻画得更加细腻、丰满。在军旅文学昂扬大气、深沉厚重的既有风格之外,女作家们这种轻灵细腻、关注个体生命经验的写作风格,有效拓展和丰富了军旅长篇小说的美学内涵。

六、“双重回归”与“两种失衡”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军旅文学在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地位松动,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获得了转身的可能与空间,得以真正意义上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人叙事,从现实真实走向虚构叙事。由此,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开始了双重回归。“一是回归长篇小说的叙事性文体本源,开始注重形式创新和语言探索,文体自觉性显著提升;二是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开始关照复杂人性和个人命运,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前者呼应了建构叙事虚构的本体性以获得文学合法性要求,注重个人化写作、自由地虚构、强调叙事及叙事主体自身的意义等等,标志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观念的觉醒和文体观念的自觉;后者则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开始关注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原本被抽离了的‘政治性结构’空洞,得到了叙事性伦理话语的填充……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获得了新的更为广阔、深厚的精神资源,获得了新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获得了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⑥通俗一点讲,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和怎样讲述故事这两个向度上的新变化,共同构成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属己性”特征标识和与其他文学史阶段区别开来的“新意”。

讲故事是小说家的本分,亦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千百年来,讲故事的手艺代代相传,叙事方法亦

随之花样翻新,于是乎故事绵延不衰,常讲常新。正像时下文学界正在持续热议的一个话题:“讲好中国故事”,其在意识形态和文学层面的丰富内涵依然需要“故事”来承载。作为“中国故事”重要组成部分的“军旅故事”,从题材上看,聚焦的是“中国梦,强军梦”的进程,直面的是新军事变革实践,讲述的是军旅人生的喜怒哀乐,塑造的是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关注的是战争进程或备战状态下军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命运;而从思想主题、价值判断、审美品格、精神向度、写作伦理等层面视之,则是与“中国故事”高度统一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构成了对“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撑,也是不为过的。

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立足“中国语境”,直面“中国经验”,而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故事是一种外在的途径和载体,最终需要被内化的情感、思想和精神所超越。具体到军旅文学领域,如何把握和重述“战争历史”、处理和提升“军旅经验”,是讲好“军旅故事”的关键所在,这对军旅作家的文学智慧和写作伦理亦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囿于自身相对陈旧的文学观念和封闭单一的生活经验,当下的部分军旅作家缺乏宏阔的视野和整体性的文学思维,缺乏聚焦当下军队新变化、观察军营新情况的自觉意识,缺乏穿透事相直达心灵的锐利目光;部分军旅长篇小说对“战争历史”和“军旅经验”的重述与表达还停留在事相的表层和故事层面的起承转合,没能向着更为本真的“存在”之境深潜,向着更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高度的写作伦理挺进。从这类作品中,既看不到我军新军事变革浪潮和信息化建设的图景,看不到我军战略战术、武器装备、训练方式和兵员成分的新变化,基于这些新变化所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反映,甚至连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在当下的部分军旅长篇小说中都是缺席的。很多作品所关注的并非当下军旅生活中最震撼人心、最带有趋向性的景观,所传达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并非是当下军队发展的主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并非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体。

朱向前早在二〇〇五年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

作蒸蒸日上,全面繁荣的情势下,就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与缺憾概括为创作题材与价值取向的“两种失衡”。“所谓创作题材的失衡,具体而言,就是现实军营题材相比较历史战争题材、地方题材的一种不平衡……此一倾向在十年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愈益彰显直至成为天下大势——在一片‘向后看’、‘向外看’和‘向前看’的大批作品包围之下,寥寥几部关注当下军营现实题材的长篇就多少显出了一种独木难成林的尴尬。如果说,一种简单的量的对比还显得武断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指出两点:一是部分优秀军旅作家其优秀长篇作品只有非军旅题材而无军旅题材;二是比较同一个优秀作家的优秀长篇,往往写过去胜过当下、写地方胜于军旅。如此看来,现实军旅题材的羸弱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所谓价值取向的失衡,具体而言,指的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不平衡或曰精神追求与商业利润之间的不平衡……十年一路走来,情形一分为二。一是少数出道早而道行高的作家利用名气和实力抓住机遇迅速与影视联姻,依靠一部大戏一炮打红从而占得先机,从此片约不断,好戏连台,不搞工作室,不进行流水作业都足以应付局面。为了赢得社会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或小说与剧本套写,或先剧本而后小说,或先小说而后剧本,或联袂出台,携手上市,如此等等。此一类作家虽然当红,但与严格意义上的军旅文学和严肃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已基本无涉。二是有的作家虽然还在坚持写作军旅题材甚至是现实军营题材长篇小说,但其作品兵味稀薄,或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或硝烟味淡,脂粉气浓,为了‘卖点’、‘看点’和‘亮点’,不惜损失甚至放弃军旅文学的基本品格为代价,迎合时尚,认同世俗,引进暴力、滥情以及商界的尔虞我诈与官场的明争暗斗等商业元素,当代军营变成了‘欲望化叙事’的又一个背景与空间。此类军旅长篇小说不过是打着军旅文学之名行与金钱媾和之实,与当下行进的军营现实基本无涉。”^⑦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回望来路,朱向前十年前发出的早期预警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进入二〇一〇年代之后,由军旅长篇小说的全面繁荣所掀起的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

潮”,已经显露出难以为继的颓势: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数量上看,都进入了下行通道。由此,便又勾连起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生活。问题或许在于新军事变革与“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实践展开并深入的速度、深度与广度已经超越了作家们的认知与经验。部分专业军旅作家远离了基层部队,对当下的军营现实生活和正在进行中的军队变革并不熟悉,有的只知一些皮毛,有的甚至干脆不明就里。如此的生活体验、知识储备与素材积累自然难以支撑正面的叙写与表现,更有甚者即便说是胡编乱造也并非言过其实。在这个流行“浅阅读”的时代,精彩好看的故事对于某些以市场反应和大众阅读为旨归的军旅作家来说,无疑是其写作成败的关键。然而,大量胡编乱造的“军旅故事”在图书市场上的泛滥,颠覆了我们关于军旅长篇小说的常识,更钝化了读者的心灵。毕竟,文学有其相对恒定的艺术评判标准,能够成为经典的长篇小说,必定是将优美精致的语言、细腻鲜活的细节以及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刻画和对人物情感的细腻描摹集于一身,从而反映出作家深邃的思想和对社会生活以及人情人性的独特认知。要想达到这样的高度,文学的美学价值、作家真切的生命体验,以及文学的精神性追求都是必不可少的维度。

注释:

①朱向前:《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军旅长篇小说十年估衡》,《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②朱向前、傅逸尘:《新世纪军旅文学:英雄主义精神向度与现实主义写作伦理》,《文艺报》2012年10月19日。

③朱向前:《单刃剑还是双刃剑——长篇小说的影视化趋向》,《文艺报》2013年1月4日。

④傅逸尘:《小说的生活质感与存在焦虑》,《文艺报》2013年8月19日。

⑤朱向前、傅逸尘:《新世纪军旅文学:坚守与突围》,《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25日。

⑥傅逸尘:《英雄话语的涅槃——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论》,第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⑦朱向前:《军旅文学题材与价值取向的失衡》,《人民日报》2005年8月4日。